

# 李吉人：乡村教育的点灯人

□杨庆珍

妻的钗环首饰与纺纱绩麻的积蓄，一齐用来办学。资金仍不足，他又多方借贷，最终将校舍增至35间。

学校由私立而公立，由初级而高级的大发展，李吉人不仅出力主办，而且把家产都捐献出来，可谓鞠躬尽瘁。最艰难的时候，全家举债，缺衣少食，贫病交加……在《即事诗四章》里，李吉人如此写道：

每月开支总不敷，况兼债主集门闾。  
苦钱满地终无用，吩咐从今要扫除。  
多病还来作教员，一心义务利无权。  
算来津贴都支尽，未了安仁买药钱。  
功课严催夜静初，寒风凛冽透庭除。  
堪怜教士心犹热，各抱薰笼看读书。  
穷困于兹已六春，益知办学最伤神。  
何时获遇赵宣子，得认鬻桑有饿人。

令人感动的是，如此困境中，“堪怜教士心犹热，各抱薰笼看读书。”一批志同道合的教师受李吉人感召和影响，穷且益坚，怀揣巨大热情，以至圣先师孔子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的精神为激励，个个抱着薰笼（川西旧时一种竹制的取暖用具），守着学生寒窗苦读。

付出必有收获。教师如此用心用情，学子也很争气，该校学风浓厚，学生成绩优秀，远近闻名。省上督学视察，称赞该校是学校冠冕，还奖励李吉人四等文杏章。1919年1月，高等二班毕业考试，大邑知事黄英、视学张渔珊到现场主考，结果全班学生的考试成绩全部优异。黄英惊讶钦敬之余，赋诗一首：

乡校宏开秋复春，群知教育有精神。  
他年若撰江原志，讲学先书李吉人。

这首诗对李吉人的办学精神和力量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江原为大邑，崇州一带旧称，先生兢兢业业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，俯首甘为孺子牛，洒尽心血。

身教重于言教，正如孔子所言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”，先生身上的正直、勇敢，正是传统儒家精神的延续。儒者，绝非仅仅是温良恭俭让，而是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（语出《孟子》），果敢英勇刚毅。毫无疑问，李先生正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。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李吉人被选为大邑县会议员，并兼议会庶务（指机关团体内的各种政务、杂项事务）。有一次，议员议薪，他与众议不合，不同意众议员要拿高薪。有人指责他“既兼庶务不得参与议薪”，他凛然道：“庶务可辞，吾舌不可结！”一句话掷地有声，令宵小之徒不敢再言。其后，议员间互相齟齬，以致倾轧，讨论议案，辄起纷争。李吉人知其不可再与共事，作了一篇鞭挞妄图以权索取高薪者的韵文《归去来辞》，表示自己不愿同流合污，从此不再参加议会活动。

还有一事，也如镜面折射出先生的为人。1921年，李吉人出任大邑县实业所长。有人说他“学非所长，越俎代庖”，还讽刺他“手伸得太长”，但他不顾非议，积

极筹办地方实业，设立劝工厂、养蚕室、杀虫室等。历时3年，实业所成绩斐然，受到了省上的嘉奖。我在县志里读到这段记载，总想起《论语》开篇第一句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。所谓“时习之”，就是在机会到来时，将所学所长予以实践，学以致用，不亦乐乎。先生对非议置若罔闻，正是大格局、大情怀的体现。窥此一斑，可见先生身上的传统儒生光芒。

李吉人一生育人无数，除了创办私塾“愿学堂”和公学“天相学校”，有一段时间，他还曾受聘担任邛崃县立联合中学主任兼授国文课。1931年，花甲之年的李吉人出任大邑县教育局局长，满头白发，皱纹深如沟壑纵横，他依然还在教育战线奔忙，洒尽最后一滴心血。1936年，风烛残年的李先生已是步履蹒跚，他的教育生涯终于结束。1944年9月25日，李吉人溘然长逝，时年77岁。

又是9月的安仁，空气中依然飘着浓郁的桂香，一个人从此化作孤星高悬。“为着追求光和热，将身子扑向灯火，终于在死在灯下，或者浸在油中，飞蛾是值得赞美的。在最后一瞬间它得到光，也得到热了。”想起在一本书上读过的几句诗，仿佛正是李吉人的写照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作为乡村教育的点灯人，李吉人呕心沥血创建的光相小学，并未在时间的河流里消失，2006年9月，大邑县教育局部门合并安仁镇区域内的光相寺小学、安仁镇初级中学、唐场镇中学、元兴乡中学等七所学校，并依托光相寺小学的原址，扩建新建，落成了现在的大邑县安仁镇学校。这是一所九年制标准化学校，以“立品敦伦、为时养器”作为今日的办学宗旨，这正是当年李先生倡导的理念。如今，安仁镇学校共有师生2000余人，教学设施齐备，育人氛围浓厚，已先后培养输送数以万计的优秀毕业生。

前人点亮心灯，薪火代代相传。漫步校园，绿树成荫。操场边一排桂花树，繁茂枝叶吐露着清芬。在初夏的风中，栀子花开满花径，如清凉的月光。紫红的九重葛如瀑布奔涌，如火焰般热烈，流淌着一曲生命的颂歌。学校东南墙根下几株蜡梅，满树繁茂绿叶，可以想象，冬来必定满树黄色蓓蕾，疏影暗香，更显校园的静雅。我想，倘若时空折叠，李吉人先生重返学校，一定会沾须微笑。学校旁边的斜江河水依然昼夜不停，奔流而去，逝者如斯夫，但有些人和事注定不会离去和褪色，就像天空中高悬的星月，亘古流长。



光相寺小学

## 名人

那是百年前一个寒风如刀的冬日，在川西小镇安仁，天空中铅云低垂，欲雪未雪。院墙下一树蜡梅，坚硬的花骨朵微微打开，吐出一阵阵幽香。又是一年除夕至，一阵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响起，面容清瘦的李吉人先生在自家门上贴出一副春联。联云：

蠡子一个，孤孙一人，积些阴德与他，凡善行尽管勉强勉强做去。

腊肉几方，挂面几把，和点菜羹待客，这新年也便简简单单过来。

对联是李吉人自撰的，红底黑字，笔迹端正清隽，引得乡邻纷纷上前围观。有识文断句的人见了，抄回去反复吟咏，赞赏不已。

隔着百年光阴，我默默诵读此联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字里行间有谦卑，有自律，也有从容和达观。如果说上联指向一种纯洁自持的品性，下联则是安贫乐道的自勉。人间有味是清欢，尤其“菜羹”二字，让人想起古训：吃得菜羹，百事可做，正好与上联的自我修持相互呼应。这副对联，简直可以说是李先生一生际遇与为人的真实写照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此李吉人，非彼李劫人。李吉人又名朝伦，字赞襄，与著名作家李劫人差不多是同时代人，但年长25岁。李吉人是安仁人，清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九月初四出生，从小酷爱学习，饱读诗书。清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考中秀才。因出身寒微，家境贫寒，清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，李吉人便在当地安仁人家开办私塾，次年改在家中，设“愿学堂”教授生童，主要课程包括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以及周、程、朱、张之学和韩、柳、欧、苏之文。

## 行踪

八月的北方，热得有点蛮不讲理了。正值我休年假回昭通的当儿，老虎打来电话，问我想不想去铜锣坝。美事降临，我岂能错过？迅速收拾妥当，第二天早爬起来，詹本林开车，带上老杨昭和我，眼笑眉飞地去机场接人。

飞机晚点了，手表指针走过12点，好汉们总算赶到。一时间，机场出口热火朝天，亮瞎双眼：老朋友胡性能、潘灵、老虎、徐兴正、包保从昆明来，新朋友田瑛从广州来。新老朋友见面，分外激动，你谦我让地上了车，先去撮了一顿美味的清真午餐，方才往铜锣坝奔去。

铜锣坝这个名字，对昭通人来说并不陌生，可惜我在外生活多年，竟没去过！这次友人雅聚，正好把我的遗憾补上了。感谢文学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铜锣坝位于川、滇、黔、渝的中心地带，地处水富市太平镇境内，从昭阳区出发，大约需要两小时车程。汽车在山间国道穿行，四周野花似锦，嘉树繁荫。过隧道时，听本林讲述他的人生故事，那些山穷水尽，那些柳暗花明，不免使人感叹：世事苍莽，梦想艰难，某些时候，只有最朴素的信念支撑我们前行。

这么想着，车已驶出隧道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我顿觉车窗外的青山、田地、村舍更加可爱。过了一个闸口，车往右道上一拐，沿着山路盘旋而上，这便是铜锣坝的方向了。本林说，前方的车道是今年刚修好的，缩短了交通时间，今后自驾去铜锣坝更便捷了。看着逐渐围拢过来的山岚，我突然想到，铜锣坝可是不折不扣的国家森林公园，森林覆盖率达96.17%，在这草木茂密之地，爱招蚊子的我竟忘了带驱蚊花露水，好大的失误！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因为铜锣坝全年平均



李吉人先生铜像

“愿学堂”开设以后，李吉人以立品敦伦为讲学宗旨。先生常言：“读书不过明理，行文无非谈道。”经十余年，学生周子渊、李象离、张子林、胥汝纶等相继考中秀才，“愿学堂”随之声誉大噪。1905年9月2日，清政府发布“上谕”，宣布“自丙午（1906年）科为始，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。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”。至此，在中国历史上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。废科举后，李吉人除教授《四书》《五经》等典籍外，兼教授《饮冰室文集》等近代论著。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李先生关闭“愿学堂”，终止了近二十年的私塾教育。

故事远未结束，李先生在筹划一件大事，他决心创办新学，以造福桑梓。两年后（1912年）的秋天，正值金桂飘香的时节，刚跨过46岁门槛的李吉人，召集安仁镇有识之士，就创办新学进行磋商。先生提议，可在光相寺址创办初级小学校，更名为天相学校，悬“为时养器”匾额，以示宗旨。为了把光相寺的几间破房扩建成学校，先生身体力行，他不仅四处奔走募捐，还率先变卖家产作为学费，延请良师，充实师资。

崭新的天相学校落地安仁，一时八方学子云集。李先生的义举传为佳话。次年，天相学校增设高等班，李吉人被县上任为该校校长。1916年，该校定名为大邑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，学校办出了名，县内及邻县家长纷纷带生童前来就读。学生不断增加，校舍需要扩建，李吉人毅然将自家赖以维生的三亩良田变卖，连同其

气温只有14.3℃，夏季平均气温亦不过19℃，蚊子躲还来不及呢！

这个季节，铜锣坝酒店外面的停车场上停满了车，有不少是川渝牌照，听说都是来避暑的。走进酒店，我更像是游荡在四川话的海洋里。巴蜀人民热爱生活的能力真不是盖的。生活嘛，冷了就给它加块炭，热了就给它搁块冰，实在太热了，就来铜锣坝！

邓传鑫，是“90后”，大学时学的是影视，毕业后到铜锣坝从事宣传方面的工作，也是我们此次铜锣坝之行的向导。第一天，小邓先带我们去玉关步道。从酒店出来，经过一条长长的绣球花圃，因为刚下过小雨，我走得比较小心，好在并没遇到湿滑处。这条步道总长有1800米，有一部分要穿过树林，有一部分则视野开阔，两旁是清新喜人的草坪。小邓说，晴朗时，游客可以在草坪上露营。步道的终点是龙门滩瀑布，我们一直往里走去，靠近一条小溪时，我远远地听到了前方的瀑布声。铮铮淙淙的声响，就像大自然在随心所欲地弹琴，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。耳朵浸泡在水流的乐音中，我不禁想起铜锣坝名称的来历。按照惯常的命名思路，“铜锣”强调的应为视觉，无非是形容此地外形像一面铜锣，但我觉得“铜锣”一词与听觉的关系更大。有说晚清时期，此地有一种树叶可以化铜水制成铜钱，借此便利，这里逐渐形成一个秘密的铸币基地。每当官府搜查，人们便敲锣传信，时间久了，此地就叫铜锣坝了。又有说，铜锣坝的湖心岛上曾有一个坝子，无数小溪从四面汇入坝中清潭，形成万千飞瀑，瀑布撞击石头的声音如同铜锣奏击。相比起来，我更喜欢水声撞击的说法，因为它强调的

是铜锣坝与天籁的联系，命名中包含的诗意源于大自然的赐予。

小溪对面是一座凉亭，从凉亭往里行，便是龙门滩瀑布了。咦，你问我怎样过溪？请看，我足底不是有一块块平整的石头吗？这里没有桥，踩着石头就可以过溪了。我给小邓说，在湖南凤凰，人们把这玩意叫作跳岩；我还去过温州泰顺，那里的仕水陡步桥也是一个接一个的石蹬，不同的是人家有两排，一排高，一排低，为此我还写了一首诗《仕水陡步桥》，形容它是“两排高低有致的琴键/……一个人走是单声部/两个人走是双声部”。正说着，朋友们都跑到石头上合照啦，一人踩着一块石头，站成一排横跨溪面，这下子可是妥妥的多声部了！

第二天，小邓又带我们去仙女湖。铜锣坝有山还不够，还有水。仙女湖仿佛一抹灵韵，给铜锣坝添上了无限柔情。在船上，朋友们谈笑风生，叙着别后寒温，新闻旧事，这般情景，就差一壶酒了。中间，我起身去船头转了一圈，又去船尾绕了一圈，脉脉细雨斜斜洒下，碧玉般的仙女湖被拥入烟雨的怀里。远处，水天皆隐于素霭之中，只闻空山鸟鸣，不知从何而起，又不知栖于哪一树，哪一枝；远处，雨丝正在船舱玻璃上一道道滑落，低低的滴答声，犹如空旷的背景音。我不禁想起林振强为《千千阙歌》填的词：“某天，雨点轻敲你窗，当风声吹乱你构想，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？”哎，总有一些时刻，我们会想起不知已飘落何处的旧模样们，然后，重新开动人生的船，继续前行。

这雨也巧，下船时渐渐小去，不多一会儿就停了。我们得以游览董家茶园，在这里，我偶遇了童年时熟悉的珙桐树。接

□杨碧薇

## 山高水长铜锣坝



Literature & 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锦观

2024年12月10日 星期二

## 书评

### 如何还原司马相如西南“踪迹史”？



《司马相如西南行》书影

1984年，联合国评选出“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”，其中之一是中国的成昆铁路。这条铁路穿越的地区，曾被外国专家定位为“修建铁路的禁区”，沿途山势陡峭，深涧密布，几乎没有平地，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。然而，两千多年前，一代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就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，硬生生从成都“走”到了云南。

先是从成都到邛都，再渡黑水（今泸水），最后到芭满，行程约四千里，往返真可谓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，沿途尽是高山峻岭，湍流险滩。这一漫漫历程，在作家王军的非虚构新作《司马相如西南行》中徐徐展开，各种历史资料、典籍文献信手拈来，详解当时的山川风貌、人文地理。是一部司马相如的西南“踪迹史”，更是一部“俯以察于地理”、融合古今的西南地区地理志。

### 爬梳典籍，“衍”起满地的历史“桂枝”

从古至今，文人西行者众。但司马相如奉诏出使西南的情形，却如烟波浩渺，踪迹难寻。

要写出这段历史，王军下足苦功，他爬梳司马相如的著述、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由此勾画出司马相如西南行的踪迹。正如王军所言：“两千多年前司马相如的著述、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就像满地桂枝，已够喜鹊衔来，搭建起司马相如西南行的桥梁。”

比如，关于司马相如开启西南行的时间，王军在司马相如《难蜀父老》中的第一句话“汉兴七十有八载”，给出了一个确定不移的时间坐标。“汉兴”之年，是公元前206年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和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都以这一年作为太祖高皇帝元年。由此推算，汉朝建立的第78年，正是公元前129年。

公元前129年，是司马相如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节点。这一年，司马相如出使西南。王军查阅多方史料，推算出司马相如已50岁，知天命之时。

就这样，在扎实考证史料的基础上，王军旁征博引，以散文诗般的语言，将司马相如这几千里路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：或是细雨连绵的严道（今荣经县一带），或是午后风狂的笮都，或是明月高悬的邛都，甚至还有“白质黑章”的“般般之兽”（大熊猫）。而读者仿佛也穿越到了两千年前，跟随司马相如跋山涉水，酣畅淋漓地体验了一场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的惊心动魄。

### 去行走、去共情，在日月山川中回望当年

此前，王军曾推出长篇历史散文著作《李商隐》，以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个人经历为主线，从其代表性诗作入手，探寻李商隐丰富的心理世界，进而呈现出晚唐的时代气象与精神脉搏。

而新作《司马相如西南行》，则聚焦他在开通西南夷、促进西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段历史。

从李商隐到司马相如，二者的创作有何不同？王军在书写历史名人的过程中，又是如何走近这些遥远的往事？王军表示，创作《李商隐》，是在古籍里徜徉，更多的是读万卷书，了解宦官专政、藩镇割据、牛李党争等时代给予他的影响，着力解析李商隐诗，甚至采用白话译文，努力接近李商隐的内心；而创作《司马相如西南行》，聚焦他在开通西南夷、促进西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段历史，更似用行万里路的方式贴近和体会司马相如开边、安边的艰辛与坚定信念，“还司马相如在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的本来面目，还司马相如在历史上长期被人所忽略的政治家的一面。”

### 从李商隐到司马相如，都有相似的人生底色

“李商隐和司马相如都写出了自己的时代精神。”在王军看来，李商隐诗深情绵邈，索解无端，具有超前的现代性和象征手法，以最恰当的文学艺术形式反映了晚唐江河日下、黄昏渐近、风雨飘摇的时代精神。而司马相如的赋特别是《天子游猎赋》，呈现出总揽万物、兼容并包的时代特征，传达出海内晏然、八方来朝的大汉气象，以及囊括天下、万端鳞萃的壮大气势与奇丽景象，充分展示了汉代盛世的繁华自信，展现了容纳万物的时代特征。“辞赋文章无法满足人的心灵之欲，却可以满足一个人寻找安心立命之归宿的需要，满足人的心灵的需求。这是‘无用之用’，是为大用。李商隐的诗词与人生底色，同样揭示出诗词对一个人安心立命的‘无用之用’。”

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